



随着中国参与和推动全球治理变革的步伐逐步加快，在世界舞台上的“朋友圈”日益扩大，当下的中国比任何时候都需要提升和加强国际沟通和交流对话的能力。在这样的时代背景下，我们应该如何学好外语？

全球化3.0时代的外语学习：从“独尊英语”走向多语互补

沈骁

2006年，一本名为《世界是平的：二十一世纪世界简史》的美国畅销书在中国走红。在这本书中，全球化进程按其主体的不同，被划分为三个阶段：全球化1.0版（1492年-1800年），这个阶段，是劳动力在推动全球化进程；全球化2.0版（1800年-2000年）是企业的全球化，工业革命扮演主要角色；全球化3.0版（从2000年至今）指的是在互联网时代，人与人之间沟通无界限，全球融为一个市场，劳动力和产品均可全球共享，国际竞争加剧，地球由此被“扁平”了。

2016年，国内也有一本畅销书问世，书名是《世界是通的：“一带一路”的逻辑》。这本书从全球化发展格局的地缘变迁提出了新的全球化3.0版本：继以亚欧大陆为载体的“古丝绸之路”带来的全球化1.0时代和以海洋为载体、以西方国家为中心的全球化2.0时代之后，以“一带一路”倡议为载体的“全球化3.0时代”正在到来。

中外两种关于全球化3.0时代的表述，不约而同地将世界关注的目光投向了东方。随着中国参与和推动全球治理变革的步伐逐步加快，在世界舞台上的“朋友圈”日益扩大，当下的中国比任何时候都需要提升和加强国际沟通和交流对话的能力。在这样的时代背景下，我们应该如何学好外语呢？

学外语强调“学以致用”，错了吗？

当学习外语的目的不是为了熟练掌握该语言，而是成为判断个人外语水平以外能力的“一把尺子”，由此足见当下社会外语学习的工具价值，已出现了一定的偏离和异化。

在全球知识经济浪潮之下，外语学习已经不仅仅是一种语言知识的简单积累和储存，而是更加注重整体外语能力的培养和提升。

须知，在结构主义影响下，我国传统的外语学习，以语言知识为结构，以词汇、语法或是基础语言技能为核心，外语考试则以语言知识点作为考查范围，由此形成了一个封闭机械的外语学习范式。

很长一段时间以来，从中小学英语到大学外语、从公共外语到专业外语，几乎所有的课程大纲或是教学指南都强调语言基本功，外语课程多以综合英语、听力、口语、阅读等形式出现，即便在外语专业“国标”体系中，还是强调语言知识。语言基本功当然是外语学习的基础能力，但外语学习不能止步于此。

在单一的语言工具性价值取向，语言被作为一种知识对象。机械式的外语学习由此脱离了思想与人文范畴。把语言当作一个自主、封闭的组织结构，割裂了语言与文学、文化与区域国别等知识课程体系的联系，由此形成了全球化时代外语教育的语言“孤岛”。

可以说，这一外语学习的传统范式，其优点是满足了基础层次有限的外语学习需求，同时也便于外语评价和考试选拔。但是，这一范式却忽视了语言的社会应用价值，缺乏开放性和交互性。

另外，一谈到外语学习，很多人会说，外语的关键是“学以致用”，这也客观说明外语学习本身的使用价值明显。但是，从语言工具主义角度看，外语学习还具有较强的交换价值，人们往往希望“投资”外语学习来获得较好的经济回报和收益。因此，在高考招生时，外语专业或涉外专业受到追捧就不足为奇了。

外语工具主义强调语言教育的标准化和可测量性，伴随着外语评价制度的建立，外语考试、考证、考级和专业资质等外语制度化话语日趋形成，学习者通过获取相关外语证书或涉外文凭等“资本”，即可获得相应的回报和收益。

须知，语言工具主义是一把“双刃剑”。本来，使用价值与交换价值应当形成互补关系，才能真正实现其具价值。但现实情况却是，外语学习的使用价值效果不彰，而交换价值则被过度强化和滥用，导致工具价值出现异化和偏离。在现实社会中，人们更关心的是外语证书或文凭背后的资本溢出效应，容易忽略真正的外语能力与文化素养的提高。因此，在激烈的社会竞争中，外语证书的交换价值往往会被某些部门和机构误用甚至滥用。

记得国内某航空公司曾在高校举办校园招聘，要求机务、签派、地勤等岗位的应聘者须持有大学英语六级证书甚至是英文专业八级证书。而有些令人吃惊的是，对于民航飞行员，民航总局提出的要求是通过大学英语四级即可。这一“双重标准”真是让人匪夷所思。

类似的案例还有不少。比如国内某一线城市在对外省市毕业生落户的打分指标体系中，明文规定了英语四、六级成绩均占有不同分值，但对汉语能力和普通话水平却没有任何要求。更有甚者，在一些社交网络论坛上，外语证书居然也成了交友或择偶的必要条件。这些怪象频频出现，让人哭笑不得。原本只是对外语学习效果评价的一纸证书，后来居然被滥用到决定能否就业、定居甚至是交友的重要指标。可以说，当学习外语的目的不是能否熟练使用该语言，而是成为判断个人外语水平以外能力的“一把尺子”，由此足见外语学习的工具价值，已出现了一定的偏离和异化。

“大才难觅，小才拥挤”，高层次外语人才依旧缺乏

近年来，中国与新兴发展中国家的交流日益增多。但无论是在政府之间还是民间层面，我们的区域和国别知识储备不足。精通和熟悉这些国家的语言文化，成为一项重要的基础工作。

当今世界的全球化以流动性和多样化为主要特征，应该看到，传统的外语学习范式已无法应对这一新变化。走出国门，仅仅依靠语言基本功并不能满足深入交往之需求。但凡有过海外生活经历的人，都会感觉到国外环境的复杂性，认识到提升实际语言能力的必要性。

所以，当下的外语学习应积极借助于以互联网为核心的现代教育技术，创设人机友好的外语学习环境和界面，通过自主学习和有效教学方法，完成外语基本知识和基础能力的学习任务。在打好语言基本功的前提下，我们要将外语学习的重点放在提升语言应用能力上，注重不同层次的多语种学习需求，制定个性化的外语能力提升规划。

需要强调的是，这里所指的外语能力，不仅指听说读写译等语言技能，也包括根据不同社会情境，得体使用跨文化综合能力和知识。

须知，我国虽有80余万外语专业在校生的规模，但是外语人才培养依然是“大才难觅，小才拥挤”，不同国际领域和行业的高层次外语人才严重缺乏。针对这一现象，教育部门和各地高校需要开展人才培养规格和需求的调查工作，根据校本特色和学校定位，调整和改革专业建设方略。

另一方面，步入全球化3.0时代，全球治理不再是美英等西方国家的

“独角戏”。世界经济发展的动力主要来自于以中国为代表的亚太和非洲地区的新兴发展中国家。但这些国家大多是非英语国家，而且和欧美发达国家在文化、社会和历史上差异明显。近年来，中国与这些国家和地区的交流接触日益增多，但是无论是在政府之间还是民间层面，我们都对这些国家和地区知之甚少，区域和国别知识储备不足。精通和熟悉这些国家的语言文化，由此成为一项重要的基础工作。

语言安全作为全球化3.0时代外语教育政策的重要价值诉求之一，贯穿和体现在不同现实领域之中，是外语教育的战略议题。外语教育政策的制定和实施，必须与维护国家安全和利益放在首位，提升国家在不同安全领域的冲突管理能力、冲突预防能力，营造语言环境。这里所指的语言安全，并不是指语言本身的安全，而是从语言的使用和应用层面，考察语言如何影响、制约、抑或保护和维护不同领域的安全。

适应城市多语种服务需求，“小语种”前景看好

规划个人外语学习计划的时候，不仅要关注国家战略转型，也要着眼于我们城市国际化的发展愿景。面对日趋频繁的涉外事务，上海对多语种外语服务的需求持续上升，城市外语治理服务水平亟待改善。

长期以来，我国的外语语种规划过于单一，从过去“一边倒”的俄语教育到后来“一边倒”的英语教育，造成了外语语种规划和布局的失衡。不可否认将英语作为当前国际通用语言学习的重要性，但我们需要考虑的是“独尊英语”带来的负面影响。

正是由于我国外语教育资源配置过度单一地倾向于英语教育，致使小语种人才匮乏。到目前为止，我国高校能够讲授的外语语种不到80种，而欧美著名高校，像美国哈佛大学、英国伦敦大学亚非学院等，动辄可开设100多门课程。所谓“知己知彼”，从国家外语资源储备来看，我们对这些国家和地区的语言还未完全覆盖，相关的区域国别研究开展起来也显得困难重重。因此，我国的外语教育语种规划，须尽快补上短板。

欧洲有句古语：“入境而不通其文，只能如提提学话。”如今，越来越多的国人踏出国门学习深造或是海外旅行，在感受世界文明之精彩、全球知识之浩瀚的同时，更能体会到熟悉和了解不同语言和文化的必要性。

德国哲学家伽达默尔曾提出一个文本理解“视域融合”的概念。简单来说，就是将跨语言和文化沟通和解读视为不同文本的理解过程的话，那么学习外语就不仅仅具有一般意义上的工具主义价值，而是被赋予一种促进不同文化理解和交流的融合性价值。在融合性价值视野中，语言本身既不是知识，也不是专业，人们需要最大限度地依靠语言去认识事物、理解世界、服务社会。外语学习的过程，实质上是跨文化学习和国际理解的体验，它的融合性价值在于促进跨文化沟通，实现不同文明的“视域融合”，促使不同语言文化互学互鉴，会通中外思想，超越文化藩篱，提高对世界不同区域国别的智识水平，构建面向未来的全球知识体系。

当我们在规划个人外语学习计划的时候，不仅要关注国家战略转型的未来，也要着眼于我们城市国际化的发展愿景。去年公示的“上海2040”城市总体规划，彰显出上海打造全球城市的创新气魄和“海纳百川”

的城市精神。面对日趋频繁的涉外事务，上海对多语种外语服务的需求持续上升，城市外语治理服务水平亟待改善。

因此，我们个人在重视英语学习的同时，结合自己专业和兴趣爱好，可以适当考虑学习更多的外语语种，尤其是一些“小语种”，扩展个人的外语资源库，这样有助于形成一个多语互补的外语学习社会，提升整个城市外语能力。

从“欧风美雨”到中国话语，外语学习迎来新的文化范式

中国将成为未来全球化进程的重要推动者和建设者。在这样的历史背景下，我们的外语学习也需要从“单向输入”转向“双向平衡”，改变过去外语学习“欧风美雨”的文化偏向，注重提升本土意识和中国话语传播问题。

有学者指出：中国将成为未来全球化进程的重要推动者和建设者。在这样的历史背景下，我们的外语学习也需要从“单向输入”转向“双向平衡”，改变过去外语学习“欧风美雨”的文化偏向，注重提升本土意识和中国话语传播问题。

不可否认的是，长期以来，中国外语学习在教学理念、教学方法和教学内容等诸多方面照搬和借用西方的一整套话语体系，而中国本土话语则处于文化表达、沟通和解读的一种“失语”状态。市面上不少外语教材奉行“拿来主义”，一些出版机构未经充分检验就直接引进并采用英美国家用于第二语言情境，而非外语学习环境下的英文教材。我们姑且不说其编写理念和使用对象是否恰当，单从其教材的文化导向看，本土意识就明显缺失。我们在外语学习中充分领略了“欧风美雨”和“甜美空气”，满足于“字正腔圆”“鹦鹉学舌”地谈论西方节日和习俗时，有多少人能流利地向外国客人介绍中国的传统文化节日？有多少人具备讲好中国故事、传播中国声音的能力？这种能力是当下中国外语学习需要重点关注的课题。

在全球化3.0时代，真正意义上的对外沟通和交往，应该建立在平等和尊重的双向互动基础上，曲意逢迎或是盲目崇拜都不是外语学习的成功之道。美国语言学家克拉克·克拉姆契认为，外语学习者通过学习一种新的语言，有助于其提升文化“移情”能力，走向一种既不同于母语文化，又区别于外国语言文化的“第三种位置”，从而达到一种比较和互鉴的“超文化”新境界。这应当成为我们外语学习新的文化范式。

(作者系上海外国语大学中国外语战略研究中心教授)



学者视点

华中科大“本转专”新规引发思考——

本科教育阶段设立淘汰制，中国高校有需求

张端鸿

学生一旦考上名牌大学，就注定能够拿到本科毕业证和学位证吗？以往这个答案似乎是毋庸置疑的，但最近华中科技大学的一则新规定引发各界热议。原来，不是考上了就一定能够顺利本科毕业！

根据华中科技大学发布的《华中科

技大学普通本科生转专科管理办法(试行)》规定，从下学期开始，普通本科生学分不达标或者因为其他原因不能坚持正常学习的，可以申请转入专科学校学习；达到专科毕业要求后，按专科毕业。

这项“本降专”的制度设计本质上就是一种本科教育淘汰制度，一方面保障本科教育的基本质量，另一方面为那些不能顺利完成本科学业的学生提供了另一种选择。

本科教育的学生淘汰是一种全球通例？

纵观全球，高水平大学保持本科教育一定的淘汰率是一种通行做法，根本目的在于保持大学及其专业的教育品质。

美国常青藤盟校等名校的本科学子淘汰率平均都超过20%。加州理工学院每年招收800名左右本科生，平均要淘汰200名左右，淘汰率约为25%。加拿大的本科学子淘汰率在15%-20%左右。英国大学的平均淘汰率约为8%-12%。俄罗斯大学的平均淘汰率约为8%。

本科教育阶段实行一定比例的学生淘汰，在我国教育历史上一直存在。1928年至1937年，清华大学每年的学生淘汰率为27.1%。西南联大每学期考试不及格的学生大概有三分之一，重要科目如果总是不及格，学生就只能要么申请转系，要么自动离校，西南联大的总体学生淘汰率达到

惊人的50%左右。如此高的学生淘汰率固然跟当时的战乱环境有关系，但西南联大的高学业标准和学校对淘汰制度的严格执行才是更重要的原因。

这在历史文献和校友口中都可以得到印证。也正因此，西南联大毕业生中涌现出了许多杰出的人才。

目前来看，我国大学本科教育的淘汰率约为1%左右，部分顶尖大学的学生淘汰率也不过5%左右。在现实当中，部分大学“老师随便讲讲，学生随便听听，轻松拿个学分，大家开开心心”的现象较为普遍。很多学生做不到自主、自律地努力学习，却期待教师能够“放水”让自己过关，还会指责那些严谨、严格的老师“不厚道”。一些大学看似还不错的考试分数背后是老师降低了学术标准和要求，分数的畸形膨胀成为大学校园里的一种虚浮现象。

“本降专”，为淘汰学生提供新的“出路”？

很多学者都对国际上高水平大学的“宽进严出”和中国大学的“严进宽出”做过反思，也普遍认为“严进宽出”是造成中国大学人才培养质量不高的主要原因。实际上，我国大学存在着非常紧迫的学生淘汰需求。

在我国，高考被视为人生第一大考。学生在高考中取得了优异成绩就会被贴上“成功”的标签。学生一旦进入名牌大学，也就被家长、家族寄予厚望。但是，由于高中阶段学习的应试训练现象非常普遍，学生的学习时间、学习内容、学习方式、考试内容都是被精细安排的。这导致他们的学习模式缺乏主体性、主动性，并且在长期的高压应试训练中失去了学习兴趣和学习目标。

进入大学之后，整个学习模式跟高中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首先，整个高中阶段同一时间内只需要同时应对的课程数量比较少。进入大学以后，一年级、二年级往往需要同时学习10-14门课程，其中部分理工科核心课程的学习难度非常大。其次，高中阶段学习和训练内容具有很强的确定性，而大学课程的学习模式、学习内容和评价标准都是多元化的，学生

在课程选择、学习时间安排等方面具有很大的自主性。第三，高中阶段整个班级都处在一种目标高度一致的高强度应试氛围之中，而大学里的班级是一个较为松散的组织，不同学生在学习目标、学习方式等方面存在比较大的差异性。

高中和大学的学习实际上是一种“两重天”的学习模式。有时候，在高中阶段能够在应试训练上取得很好表现的学生，进入名牌大学后如果缺乏自主和自律，不懂得如何探究和合作。第一年的学习和生活会尝到苦果。在很多重点大学，理工科核心课程的不及格率达到20%-50%，累计若干门课程不及格之后就要被迫降级学习。不及格学分累计在高位徘徊达到一定时间限定就会被通知退学。这实际上反映了大学对不合格学生进行淘汰的内在需求。不少知名高校的理工科专业都汇集了一批五六年级、六年级生，这些学生往往坚持到最后，也拿不到学历、学位证书。

华中科技大学“本降专”的做法，实际上就是开辟了一个新的“出口”，给了淘汰生一条新的“出路”。

本科教育的淘汰制度该如何设计？

实际上，我国的高水平大学并不缺少学生淘汰的制度设计。但是在大学本科教育中严格执行淘汰制度为什么那么难？为什么原本不达标就理所当然应该淘汰的政策会受到来自各方压力的干扰和影响？

首先，学生一旦被淘汰，重新起步的成本太高，整个社会还没有给淘汰生建立起一种包容性的制度和环境。学生一旦被淘汰，再次进入高等教育系统学习的成本非常高，往往都必须付出重读高三、再次高考的高昂成本。

其次，当学生和家长面临被“淘汰”的时候，会感到一种巨大的落差。一旦淘汰真的落到学生头上，就会出现各种求情、闹剧、“放水”。不少家长找到学校就愤怒的质问一句话：“高考成绩那么优异的孩子交到你们手里才一年(两年)，怎么就变成了这个样子？”从大学教务管理和学生管理部门的角度来说，他们普遍认为在严苛应试训练下成长出来的孩子，缺乏自主、自律，客观上高等教育也不可能按照“高中化”的模式来对学生进行培养，所以相当一部分孩子在大学出现学业滑坡是“注定”的事情。严格执行标准的教师则会冠以“关公”的恶名，学生在后来的选课中就不再选他们。个别教师还会遭到学生和家长的无理攻击。此外，也有不少学生在这种巨大落差之下产生心理问题，大学出于维稳安全、稳定的考虑也不得不给学生“放水”。

笔者认为，学生淘汰机制是提高高等教育质量的有效杠杆。严格执行学生淘汰制度不应该成为一种“费力不讨好的事情”，更不应该成为新闻。

高水平大学应当达成一种共识，如果执行严格的学术标准，入学的学生中必然会有一部分因为学业表现不合格而毕不了业，并且要将这种“本科教育注定存在淘汰”的观念在招生过程中就传递给考生。学校应该在本科教育质量公报和年度统计公报上向社会公布近五年的学生淘汰率。

高等教育系统应当进一步架构起淘汰之后的“出口”和“出路”。目前，部分高校除了选拔性的学业优秀生申请转专业制度之外，也建立起了“专业学习不适应”学生转专业的机制，这就为在专业内部淘汰的学生提供了缓冲。

事实上，优秀生考插班生的制度在部分院校中已发挥了很好的作用，我们还应当研究面向被淘汰学生、建立转学的“申请-考核”制度。为这部分学生在被本校淘汰之后，还有机会留在普通高等教育体系中学习创造制度安排。此外，部分高校为淘汰学生提供了保留修读学分的政策，当他们被淘汰后选择再次通过高考进入学校时，所有获得过的学分都是被承认的，这是一种非常人性化的安排。被淘汰的学生还可以通过成人教育、开放教育、网络教育、自学考试等多种途径接受高等教育。

社会接纳的是有学历的人，而不只是有学历的人。而在形成淘汰是一种“必需”的共识和求学“立交桥”构建起来之后，就应当要求教师和教育管理部门严格执行淘汰制度。从这个角度而言，华中科技大学的“本降专”制度正是该校进一步严格执行淘汰制度的前奏。

(作者系同济大学高等教育研究所讲师)